

东北师范大学

文库

15-17 世纪 中英两国农村经济 比较研究

王晋新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15—17 世纪中英两国
农村经济比较研究

王晋新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长春

(吉)新登字 12 号

15—17 世纪中英两国研究
农村经济比较

15—17 SHIJI ZHONG YING LIAN GUO
NONGCUN JINGJI BIJIAO YANJIU

王晋新 著

责任编辑:谢又荣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李 薇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邮政编码:130024)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8.75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5 千	印数:0 001—500 册	
ISBN 7 - 5602 - 1896 - 2/K · 113	定价:12.00 元	

序

朱 寰

晋新同志承担的国家“八·五”期间中华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研究项目,最后完成这部专著《15—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这是一部研究中英两国由封建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著作。自80年代以来,他一直从事于这方面的研究,博士论文曾作过类似的题目,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过有关的文章;赴英作访问学者期间,又取得了与英国学者进行交流和搜集资料的机会,对于丰富和提高他的研究成果颇为有利。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

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是二战后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对这有关问题的大讨论,时起时落,历时数十年,兴趣不减,迄今仍在不断扩展和深入之中。二战后关于向近代过渡问题学术大讨论,曾掀起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开始于1946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史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所引起,欧美许多学者都卷入这个浪潮。讨论文章比较集中地发表在英国杂志《科学与

社会》上。后来英国学者希尔顿(Rodney Hilton)把讨论文章汇集成册,1976年在伦敦出版,题名《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在30年后,1976年又掀起第二次讨论高潮。这次是由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引起的。他在英国《过去和现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英国经济史学家波斯坦等主张人口决定论的观点,提出了阶级结构决定论的主张,从而掀起了第二次讨论高潮。这次讨论文章大都发表在上述英国刊物上。这两次国际学术大讨论无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历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这两次学术讨论也有很大局限,其中主要之点是,只限于讨论欧洲封建主义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甚至于所谓“欧洲”,更多地是指英国,欧洲大陆诸国也很少涉及。至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是怎样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它们过渡的时间断限、走过的道路、表现的规律性及其特征等等,这一切全被置诸讨论的视野之外。

在我看来,王晋新同志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学者的界限,把中英两国的过渡问题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摆到国际学术界面前,这就促使大家不得不重新考虑许多问题。

我认为这部著作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研究中英两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着重研究其封建末期农业经济的矛盾运动,是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封建经济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农本经济。农本经济,正如作者在《绪言》第二部分中所指出的,不仅包括“农村经济这一主体成分”,而且还包括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在内。“以农为本”的另一面,就是“以工商为末”。农本和工商末是封建经济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两种经济成分矛盾运动的过程。它们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又相互差异、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封建经济这两种成分在又同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农业处于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商业处于从属地位。这种

主从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社会专业分工愈益加强,处于末业地位的工商业发展到高水平时,商品货币经济就会瓦解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工商业由从属地位转化为主导地位,使封建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封建社会形态逐渐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一切变化的根源首先来自农业,以农为本的封建自然经济制约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因此,我认为这部著作抓住了根本,牵住了牛耳。

其次,这部著作对15—17世纪中英两国农业经济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都有足够的事实根据,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作者从土地的所有和占有状况入手,进而剖析了两国的地产运动、农业生产状况和经营方式、农村副业等多方面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耕织结合的封建农业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独到见解,所在多有,颇有启迪作用。譬如,书中指出,耕织结合是中英两国农本自然经济的共同点。但是耕与织两方面都有其相同和相异之处。在耕的方面都是以种植粮食为主,解决人民“食”的问题;但在解决“衣”的方面两国差别很大,中国以棉、丝织品为主,原料来自种植业,英国以毛织品为主,原料来自畜牧业。由于耕织结构的内容不同,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差异:产业结构、经营方式、耕作模式等都不相同,以致产生向近代过渡的不同特点。^①

最后,这部著作把封建社会末期中英两国的农业经济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比较。这是史学比较研究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迄今为止,类似的著作,尚不多见。记得在1991年王晋新同志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上,答辩委员李洵教授曾颇有感慨地说:“我曾认为,中国历史与英国历史不能比。中国那么大,发展又不平衡,怎能与国土较小、发展相对平衡的英国相比?!在读过晋新同志的论文之

① 请参阅本书第三、四章。

后,我相信中英两国历史是完全可以比较的,而且确实能比出一些发人深思的道理来。”作者对 15—17 世纪中英两国农业经济的比较,不仅突破了西方学者的某种欧洲界限,而且也为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打开了眼界,开扩了视野。中外历史的研究可以彼此借鉴,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人类社会历史一次重大转型。从此以后,人类社会突破了农本经济的孤立、分散和闭塞的状态,把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和地区连成统一的整体,世界统一市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从此开始形成。因此对这个过渡时期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多面工程。它不仅涉及经济,而且还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仅就经济而言,此书只是研究了封建末期中英两国农业,至于在此以后的各时期和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此书出版有了个良好开端,只要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研究下去,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时值丙子初秋,学年伊始,诸事繁忙,草草为序。

1996 年 9 月于石竹斋

本书系“八五”国家中华哲学
社会科学青年研究基金项目

本书系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cal scientific theories of Marxism as basic guidance, and scientific comparison as basic research method, this book attempts to enunciate and measure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extent of change of rural economy of China and Englan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udor Dynasty, so as to enrich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ange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England separately.

This book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as the introduction, explains why I chosen this topic, what is my basic theor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opic as well.

The second part, which is the main body of this book,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ownership and holding types in both countries, demonstrates that the land ownership and its holding types are dominant factors behind the framework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rural economy.

The second chapter, comparing the land mergence with the movement of real estate, shows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large scale changes of ownership of real estate in both countries, the pathes, the trends, functions and natures of the change are very different in both countries. In Ming China, the change of real estate is the result

of land mergence basically, which lead to enlargement of landlords property. In Tudor England, the change of read estate benefit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land ownership.

The third chapter is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arming method and management in both countr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ime examined by this book,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went a great change. However, as a result of various factors, there emerg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production structures and technical model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tenancy system formed the basic type of th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 both countries, but there was apparent different in terms of tenancy relationship, the types of land rent, and tenant size. Although there were employment farming in both countries, it was only a complementary factor in the production type of feudalism management during Ming China, but a main factor contributing to new production type in Tudor England. The technical model of Chinese agriculture was simple plant of grain with 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but in Tudor England the technical model was grain farming combined with animal husbandry.

The fourth chapter focus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amily — oriented by — product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in rural area of both countries. The tremend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textile industry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common character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both countries. However,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his development o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is very different in both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in Ming China made the natural economy more stable; In Tudor England,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wool textile industry accelerated the separation of farming and textile industry, paving the way for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big enterprises.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which generalize the influence of rural economy on the commerical economy, the capitalistic production type, and consequently, the function of balance and improvement of rural economy in the intergr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目 录

序.....	朱 寰(1)
绪 言.....	(1)
第一章 关于土地所有和占有状况的比较	(12)
第一节 土地的所有形态	(13)
一 土地所有的类型	(13)
二 地产产权的基本结构	(20)
三 大土地所有制的内部构成	(26)
四 小土地所有制的内部构成	(31)
第二节 土地的占有形态	(33)
一 土地占有的基本状况	(34)
二 土地占有形态的变革	(37)
第二章 关于地产运动的比较	(49)
第一节 地产运动的基本状况	(50)
一 明朝的土地兼并	(50)
二 都铎王朝的地产运动	(56)
第二节 基本相似的共同特征	(62)
一 规模之大在各自国家封建经济运动史上都属罕见.....	(62)
二 参与地产运动的人遍及两国社会各个阶层	(64)
第三节 地产运动的基本差异	(67)
一 产权变动方式上的差异	(67)
二 产权变动趋势的不同	(71)

三 产权变动的经济功用不同	(76)
四 产权变动的根本性质不同	(82)

第三章 关于农业生产状况和经营方式的比较

(84)

第一节 两国农业生产的状况

(85)

一 两国农业产品的增长	(85)
二 两国农业生产技术的状况	(91)

第二节 两国农业生产中技术结构状况

(96)

一 两种不同耕作模式所反映的不同农业产业结构	(98)
二 两种不同耕作方法与人力投入的关系	(99)
三 两种不同耕作方式与农业经营规模的关系	(101)
四 两种不同耕作模式的经济效益	(104)

第三节 两国农业生产的经营体制

(106)

一 两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状况	(107)
二 租佃制经营形态	(113)
三 雇佣制经营形态	(130)

第四章 关于农村副业和农村工业的比较

(147)

第一节 两国农村纺织业的发展概况

(148)

一 明朝时期的农村纺织业	(149)
二 都铎王朝时期的农村纺织业	(153)

第二节 两国农村纺织业的相同、相似之处

(159)

一 两国农村纺织业发展的前提	(160)
二 两国农村纺织业在各自国度的经济地位	(165)
三 两国农村纺织业对各自国度农村经济结构的影响	(167)

第三节 两国农村纺织业发展的差异

(170)

一 两国农村纺织业与农业产业结构的关系	(171)
二 两国农村纺织业商品化的程度不同	(175)

三 两国农村纺织业的生产组织和经营方式不同·····	(186)
第四节 对两国农村纺织业的总体认识·····	(197)
结束语·····	(202)
 附一 都铎王朝对教会地产的剥夺及其历史意义·····	(207)
附二 人口运动与社会转型	
——人口史学与英国近代初期社会经济史研究·····	(227)
主要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63)

绪 言

公元 15—17 世纪的中国和英国分别处在明朝 (1368—1644) 和都铎王朝 (Tudor Dynasty 1485—1603) 的统治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 亚欧大陆的农耕世界文明的发展格局呈现出新异的变化。曾率先进入封建社会阶段的东方, 特别是曾以其先进的生产力、社会体制及思想文化领先于整个世界的中国, 逐渐丧失了领先的地位; 较中国晚近千年的姗姗步入封建社会的西欧, 特别是偏居大陆以外的海岛之国——英国, 却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和姿态迅猛崛起, 与西欧先进国家并驾齐驱, 居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窃以为导致这种历史发展格局的根本缘由, 就在于东方与西方, 特别是中国与英国, 在各自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变革进程中所行进的步伐大小不一, 速度不一, 在于各自所遇到的阻力和助力各异。

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问题是国际、国内史学界所共同感兴趣的热课题。

自本世纪初以来的西方学术界, 围绕着这一课题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流派,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贸易根源说”(亦称商业化模式)、“人口根源说”(亦称人口学模式)、“社会阶级根源说”(亦称阶级结构模式)、“产权根源说”(亦称产权模式)和

“世界体系说”等诸种学派。

“贸易根源说”的最早提倡者是比利时的史学大师亨利·皮朗(Henry Pirenne)。自本世纪50年代始,美国的P. 斯威齐(P. M. Sweezy)成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从中古时期农村社会外部,即海运贸易和城市贸易结构的变动中,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市场的力量决定农奴制的兴衰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这种观点,在50年代时,遭到多布(Maurice Dobb)、希尔顿(Rodney Hilton)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评。从60年代起,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M. M. 波斯坦(M. M. Postan)在对“贸易根源说”的批判中,提出了“人口根源说”,并得到了法国学者L. 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强有力的支持。他们认为应当从中古社会的人口数量增减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去寻求社会变迁的转变。美国加州大学教授R. 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70年代发表了题为《前工业时期欧洲农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①一文,对“贸易根源说”特别是“人口根源说”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推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贸易”、“人口”之类的经济结构,而在于“阶级结构”,正是由于英国农村社会形成了新的阶级结构,“使英国农业的转变成为可能,这是英国经济发展成功之关键”。布伦纳的“阶级结构模式”学说的提出,使西方学术界关于西欧中古封建社会的瓦解和向近代化过渡的争论,再次推向高潮。虽然,有关论文已编辑出版^②,但余波尚未全平息。

70年代之后,“世界体系学说”和“产权理论学说”相继产生,又一次对西欧中古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研究形成较大的冲击。“世界体系理论”是由I.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创立。

① 该文发表于英国《过去与现在》季刊第70期,1976年2月。

② 见T. H. 阿什顿、C. H. E. 菲利浦主编:《布伦纳论战论文集》。

在将社会存在视为一个不断运动的“历史体系”，和“重视较长历史时期和较大空间范围的经济分析，把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统一起来，注重理论的启迪意义”三项原则的基石上，沃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分析模式。他说：“如果假定分析的单位是这样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国家、民族或种族，那么结果就会迥然不同。我们与众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将注意力从各国内在的特点转移到其他相互联系的特征之上。我们不再把阶级（或阶层）看成国家内部的集团，而是将其视为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的集团。”依据这种认识，沃勒斯坦提出资本主义不是一国范围内孤立的现象，而应是由出口加工制成品的“中心地带”（即西北欧）和分享与生产中间产品的“半边缘地区”（即南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生产农产品和金银贵金属的“边缘地带”（即东欧和拉丁美洲殖民地）三者共同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正是在“边缘地带”和“半边缘地带”提供的原料、货币和市场的前提下，“中心地带”的资本主义方式顺利地成长起来；但若无“中心地带”的发展、扩张，非中心的广大地带也难以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一“世界体系学说”的创立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也招致了许多批判。一是批评这种理论漠视了阶级、阶级斗争在社会行进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二是批评该理论过分夸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将广大的东欧、亚非、拉丁美洲地区置于完全被动的消极的边缘位置，忽略了众多的国家、地区、民族的独特历史发展过程和各种差异特殊现象。

“产权学说”是由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 D. C. 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 R. P. 托马斯（Robert P. Thomas）提出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成长发展在于经济增长，而一种保障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这方面，产权制度的作用最为关键，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起和衰落，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都有极为